

## 從政策哲學檢視我國新冠病毒的防疫

徐仁輝\*、邱筠惠\*\*

### 《摘要》

2020年我國在新冠病毒防疫方面表現傑出，舉世矚目，我國防疫成功關鍵在哪？本文分別從功利主義、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哲學觀，探討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以及成功的條件。依功利主義的觀點，公共政策的目的是提升社會福利，成功的政策應追求績效；從自由主義的觀點，公共政策出現目的是因為政府的介入，可以矯正市場的失靈，成功的政策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公開透明與公正，同時照顧弱勢；社群主義重視社群的歸屬感與締結的盟約，政策目的是為了促進集體的安全與繁榮，政策的成功在於加強宣導與溝通，鼓勵全民參與，追求共同目標。陳時中部長在答覆外國媒體詢問時，回答防疫有成的關鍵在於「專家、政府與人民」，即政策制定聽從專家意見、政府決策過程公開透明、以及人民的充分配合。我國防疫政策可謂融合了三大哲學觀點的主張，如政策制定以專業績效為導向、政策執行則依法行政與公開透明，並注重政策的傳播，以爭取國人的信任與形成共識，做到全民抗疫。

[關鍵詞]：公共政策、新冠病毒、功利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

---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e-mail: jhhsu07031955@gmail.com。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博士生，e-mail: bubunichiu@gmail.com。

## 壹、前言

2020年初在中國武漢發現的新冠病毒迅速擴散全中國，蔓延全世界，造成大量人民感染與傷亡，同時重創全球經濟。我國在這次的防疫表現傑出，為國際矚目，堪稱楷模。我國的防疫政策成功關鍵在哪？拋開醫療防疫專業技術方面的探討，可否從政策哲學觀點驗證之？

Lasswell (1971) 提出政策科學的研究，建議政策研究應結合政策過程脈絡與問題解決兩方面的探討；其中問題解決部分須找出解決問題的政策工具背後之理論哲學。Weimer 與 Vining (2017) 立基於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與自由主義 (Libertarianism) 的哲學基礎上，以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詳盡解析各項政策工具如何達成效率、公平等價值目的，完整建構了政策工具理論。Fischer (2003) 則利用後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強調所有政策參與者，包括普通公民，對於問題、政策工具、執行與評估等的詮釋、審議與建構等之重要性；他的研究與社群主義學者 (Communitarian) 所強調的公民溝通與理性思辯有一致的觀點。

Sandel (2009) 分別從功利主義、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角度，探討正義問題；本文亦擬利用此三大哲學基礎，來檢視公共政策的制訂目的，以及探討成功政策須具備的條件。

功利主義認為政策的目的是提高公共福祉，成功的政策自應選擇淨效益最高的計畫，並補償受害者。自由主義重視人們的選擇自由，公共政策的出現係因為市場交易有問題；成功的政策應建立在法治基礎上保障權利，並促進競爭與保障弱勢。社群主義強調群體的歸屬感、團結、責任、義務與榮譽等，政策制訂目的在於促進社群的集體目的，因此成功的政策應爭取成員的信任與認同。

本文首先分別深入探討三大哲學對公共政策的觀點，再對臺灣的防疫政策予以檢視，是否符合三大哲學觀有關政策制訂的要求與成功的條件。

## 貳、功利主義觀點的公共政策

功利主義或稱效用主義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英國哲學家 Bentham，他主張作正確的事情就是最大化幸福 (happiness)，這是道德的最高原則；所謂的幸福或效用

(utility) 係指快樂 (pleasure) 減去痛苦 (pain)。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要帶給人民最大的幸福。

## 一、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

依功利主義觀點，公共政策的制定標準，需檢討是否所選擇的政策方案較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以帶給社會更多的幸福？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訂自然要重視專業，追求績效。政策的決策就是透過精細的成本效益分析，將所有的成本與效益換算成金錢，並予以折現，再比較所有替代方案的淨現值，選擇淨現值最大的方案。不過成本效益分析最大的問題在於，並非所有的成本或效益皆可以金錢化，如生命的價值。

## 二、功利主義的問題與補救

功利主義尋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亦即最大化加總所有人的快樂減去痛苦。如果一項公共政策並非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例如僅是簡單多數決通過的政策，反對的少數人的幸福或效用可能就被犧牲，也就是少數人的權利可能被漠視或剝奪。還有如果快樂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呢（如奴隸制）？因此 Mill (1859) 建議快樂應該區分高低，高尚的快樂係指建立在知識與道德基礎上，高尚的快樂才應該被計算與考量。

又快樂與痛苦是主觀的感覺，人人的衡量尺度不同，如何加總呢？Pareto (1894) 的效率原則建議如果一項改變或政策，有人更幸福而無人受到傷害，這項改變或政策就稱為「Pareto 改進」(Pareto Improvement)，理論上應該可以獲得全體一致決。然而現實社會中大多數公共政策有受益者也可能有受害者，很難符合 Pareto 的改進原則。因此 Kaldor (1939) 與 Hicks (1939) 兩位學者先後提出了「潛在補償原則」(potential compensation principle)，只要受益者的利益足以補償受害的損失而有剩餘，這項政策即可採行。

## 參、自由主義觀點的公共政策

自由主義強調天賦人權，相信人民的生命、財產與自由權利是天賦的，早於國

家政府的建立即存在。自由主義反對政府的管制，主張愈小功能的政府愈好，對市場應該採取放任自由的方式，尊重人民的選擇自由。極端自由主義更反對政府一切的父權主義立法（如道路與建築安全法規）、道德立法（如反同性婚姻）與所得重分配政策等（Nozick, 197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Hayek（1960）更認為政府為縮短貧富差距所作的一切政策皆是強制性的，將迫害自由的社會。另一位得主 Friedman（1962）則警告人們，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政策皆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例如社會安全制度、最低工資政策、執業證照核可等。

## 一、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

自由主義尊重市場自願交易機制，認為在自主與互惠的原則下，人們所簽訂的交易合約（contract），係立基於自由選擇的權利上，屬於買賣雙方的共識，政府公權力自不應該干預。然而現實生活中契約的簽訂經常存有經濟不平等或違反社會倫理等問題，面對這些狀況，政府公權力與公共政策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如反對器官買賣、毒品與性交易，以及消費者保護等。面對這種狀況，自由主義學者主張為保障人民的自由選擇，公共政策必須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公開、透明與公正；因此政府應制定一套完整的法規制度（如民刑法、商事法等），規範人們的交易行為。

自由主義學者崇尚競爭市場，相信競爭可以有效率的配置資源，帶給社會更好的結果。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大多數的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不僅廠商的生產非效率，社會資源的配置亦非效率。此外部分財貨具有非排他的特性，即所謂的「公共財」（Public Good），讓市場價格機能無法正常運作。而有些財貨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會產生「外部性」（Externality），讓市場價格未能反映真實的成本與效益，這些「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問題導致市場無法有效率配置資源（Rosen & Gayer, 2013）。這些問題皆讓政府公共政策找到了干預市場的正當理由，不過其目的主要是為了資源配置效率，而非為保障人民的權利（Sandel, 2009）。

## 二、自由主義的問題與補救

為避免過度強調個人自由而侵犯他人之權利，甚至違背了人道、生命價值與社會倫理，康德（Kant, 1785/1964）呼籲大家應遵循依理性思辯獲得的「自然律」

(natural law) 美德；他認為人們堅守美德不是為了預期要有好的結果，而是人們深信有義務遵守，如此才算自由的人。康德的自由主義要求人們在自由選擇的同時，遵守許多的道德規律，同時不應把別人當作工具。

Rawls (1971) 的「社會正義論」(social justice) 認為人們的選擇係透過「無知的面紗」(veil of ignorance) 而為，因此應該拋棄本位站在「原點」(original point)，多做真理的溝通；而讓社會底層人們福利最大化(Maxmin) 的政策應該被採行，如此符合社會正義，也等於為大眾買了社會保險般，因為誰也不知道那天會淪落為社會底層。他的「差異原則」(difference principle) 更指出才智高低造成的經濟差異是可以被社會容許的，只要能讓底層或才智低的人們福利提高；他同時主張無論才智高低，大家都應該努力，從市場中獲取應得的報酬；Rawls 的差異原則給予政府所得重分配政策的合理性。

## 肆、社群主義觀點的公共政策

在上世紀 80 年代一群對自由主義批判的學者，認為自由主義過度強調人們的權利，而將良善(good) 的判斷擺在次位，會出現判斷社會正義的困境問題，如同性婚姻、墮胎、器官買賣、代理孕母等許多社會大眾爭議不斷的議題。這些學者被稱為社群主義學者，他們認為符合社會正義的事情，應該與社群的目的、情感與責任等脫不了關係(Sandel, 2009)；即公共政策的選擇與社會欲達成的集體目的息息相關。

### 一、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

社群(community) 係一群人基於血緣、經濟、環境等各種不同因素群聚生活在一起，社群的形成有其存在目的。人們對於生活的社群有認同與歸屬感，進而產生榮譽、責任、義務、同胞愛與團結等美德。社群內的公共事務需要治理，因此產生了國家與政府，許多公共議題的解決需要政府制定正確的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的制訂自然須考量當前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目的，這目的就是促進集體的安全、繁榮與永續發展，也就是追求「共善」(common good) (Sandel, 2009)。

社群的成員係基於互惠互利(reciprocity) 原則結合的；互惠互利係指尊重別人

的權利，不侵犯別人自由，行為有道德，每個人皆盡一己之力，服務他人與貢獻社會，每個人皆因此獲得最大的利益。而要每個人皆能行為有道德，需要政府實施國民教育，給予正確的倫理規範與道德，同時也有賴政府完善的法規制度，培養禮教與社會風氣，邁向社會集體道德（Miller, 1989）。

## 二、社群主義的問題與補救

社群主義強調優質的公民素養與公民的積極參與，然而這也是現實社會有待努力的問題。優質的公民素養必須是對公共議題具有理性思辯的能力，同時具有容納不同意見的雅量。然而隨著人類社會的工業化與都市化，公共議題愈趨專業化，對公共議題的認識必須花費時間與具備專門的知識。同時在民主國家的投票決策中，公民會感覺只是眾多選民之一，幾乎無影響力；又代議民主透過民意代表亦無法真正反映民意，選民會選擇做個「理性的無知」（rational ignorance）者，不願意花時間對公共政策多所了解，同時也無意願參與公共決策。且選民的意向又經常是受傳播媒體或群體的影響，而出現系統性偏差（Caplan, 2007），甚至非理智的群眾運動。

在公民社會的時代，隨著公民參與的平台增加，參與的成本降低，公共治理的方式已孕育而生（Edwards, 2009）。然而由於公共政策無論從問題的界定、目標的選擇、工具的比較、政策的採納、到執行與評估等過程，皆涉及眾人的不同認知、詮釋、論述（discourse）與社會建構（Fischer, 2003）；因此必須透過公開透明平等的機會與平台，經過審議民主，以「溝通理性」（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的態度才可以匯集人民的信任與認同，讓人民與政府共同為這個社群的集體目的與「盟約」（covenant）一起努力。

## 伍、公共政策制訂目的與成功條件：三大哲學觀的整合

依上述分析，功利主義觀點下公共政策的制訂係為了替國家社會追求更好的結果，提升社會福祉；因此政策的制訂標準應以其能產生的績效多寡作判斷，即透過詳實精確的成本效益分析，選擇淨效益最大者。不過那些成本與效益應該納入與計算，應作審慎的考量，不能違反人道、責任義務與倫理道德。政策成功條件在於追

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同時，應發揮同理心，對受到傷害的少數給予適度的補償。

依自由主義的觀點，政府應尊重人民自由選擇的權利，減少對市場交易的干預；公共政策的制訂目的是因為市場出現不平等、違背社會倫理、或非有效率配置資源以致於無法產生好的結果時。政策成功條件在於建立完善的、公正的法規制度，保障市場交易，並促進競爭；又為避免自由交易違反善良社會風俗或侵犯人權，應強調道德規範，以及透過所得重分配照顧弱勢。

依社群主義的觀點，公共政策的制訂目的係為了達成社群的集體目的，即集體的安全與繁榮。因此公共政策應強調公民的歸屬感、同胞愛、榮譽感與責任心，培養公民素養、審議思辯與溝通理性。政策成功條件在於多作宣導與溝通，鼓勵公民的積極參與，爭取公民的信任與認同。

以上從三大哲學觀點，觀察有關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與成功的條件，整理如表 1：

表 1 公共政策制訂目的與成功條件

政策哲學	政策制訂目的	政策成功的條件
功利主義	提升社會福祉	專業績效導向、辨別與精算成本效益、補償少數人損失
自由主義	校正市場失靈	完善公正的法規、保障交易契約、促進競爭、強調道德、照顧弱勢
社群主義	追求集體目的	培養公民素養、鼓勵公民參與和溝通、爭取信任與認同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陸、新冠肺炎疫情與我國防疫政策

### 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2019 年 12 月中旬中國武漢市發現一種新型肺炎病毒，但疫情一開始遭到輕忽與隱瞞，遲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漢市才進行嚴格的封城防疫措施，造成春運期間估計約有 500 萬人離開武漢返鄉過年到全中國，並有 6 萬餘人出國旅遊；將病毒散布到世界各地。

世衛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雖在 2020 年 1 月 7 日宣布發現新病毒，並命名為「2019 新冠病毒疾病」（COVID-19）；但遲至 3 月 12 日才宣布病毒達全球大流行特徵，呼籲各國加強檢測、隔離、追蹤等，防止疫情擴大與避免社區感染。

由於 WHO 的警示過晚，歐美國家的病毒群聚感染已相當普遍，再加上人民防疫認知薄弱，各國政府對此病毒危害問題疏於認知，無論媒體或公共皆未視為議題，政府的防疫政策與應變能力更不積極，且不少國家主政者更是不尊重專業，出現荒腔走板的言論，將疫情帶入危境，至難以收拾的地步。至 9 月下旬全球確診人數超過 3,000 萬人，死亡人數超過 100 萬人，有疫情國家遍及 190 國。

由於多國封城鎖國，國際貿易與旅遊幾乎停頓，各國國內零售餐飲休閒業亦萎縮，導致經濟大幅度衰退。6 月 8 日世界銀行發表全球經濟展望，預估 2020 年全球經濟將較前一年萎縮 5.2%；同月 24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預測 2020 年全球經濟將出現負 4.9% 的成長；為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後最嚴重的衰退；多數國家政府不得不採取大規模紓困與振興經濟政策。

## 二、我國的防疫政策

政府因有 2003 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的慘痛經驗，警覺心非常強，武漢的肺炎案例爆發後數日，讓此項媒體與公共議題很快成為政策議程，政府迅速訂定各項防疫政策與應變措施。如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即開始啟動人員登機檢疫措施，2020 年 1 月 2 日成立應變中心，20 日成立三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27 日升級為一級。為貫徹政策透明與溝通，疫情指揮中心每日召開記者會，報告疫情發展、聽取民眾意見與宣導防疫政策。

防疫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口罩，口罩作為戰備物資的管控政策，早在 1 月 24 日政府即作出禁止出口政策，然因出現民眾搶購風潮，政府當即下令由政府徵用統一配售民眾；惟仍出現一罩難求現象，政府乃推出全球首創的口罩實名制度，基本解決了民眾無口罩可用問題，有效防止疫情擴散；口罩管制政策隨執行狀況的與時俱進修正，正驗證政策執行是一種「演進」（evolution）過程（Majone & Wildavsky, 1979）。臺灣的口罩生產又因相關產業廠商投入口罩國家生產隊，很快的可以日產近 2,000 萬片，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生產國。更在 4 月 1 日由蔡英文總統宣布捐贈

1,000 萬片口罩給美國、歐洲義大利等 11 國與友邦國家；嗣後又陸續捐贈新南向與鄰近國家，善盡國際社會責任。

我國的防疫政策可以說隨時依據國際疫情的發展進行滾動式檢討，至 3 月中旬即訂定有 100 餘項措施與辦法。其中包括民眾出入境進行邊境檢疫、境管措施及旅遊警示標準等；對疑似病例進行病毒採檢與設置集中檢疫所等措施。醫療機構則採取分倉分流制度，並限制探病訪客人數、與強化醫院人員的防疫訓練、超前布署提升防疫醫療物質、人員與空間設備等。

全民健保的就診雲端大數據與移民署的入出境等資料庫的彙整與勾稽，亦有效的發揮精準防疫功能。防疫單位嚴守把關，機場與疑似對象採檢外，並結合電信業者的智慧疫調準確掌握可疑病例行蹤並提醒國人注意（如使用細胞廣播）等，利用數位科技實施遠端定位追蹤個案行蹤與接觸對象予以管控。同時要求各級政府與民眾配合嚴格做好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與自我健康管理等，而各級政府與全國民眾亦皆全力配合，例如居家檢疫或隔離人數在 3 月下旬即高達 5 萬餘人，違規者只有少數。

我國的防疫政策與措施產生極大的成效，至 3 月 5 日臺灣確診人數僅 42 例；3 月 18 日起因歐美各國疫情爆發，國人回流致每日確診人數呈雙位數增加；4 月中旬又發生敦睦磐石艦官兵集體染疫事件，不過並未出現大規模社區感染。截至 9 月下旬確診人數僅 500 餘人，且多為境外移入案例，連續數月無本土案例。

### 三、有關我國防疫成功因素的報導

我國的防疫成功，獲得國際多數主流媒體的持續報導，特別是 4 月間歐美國家疫情嚴重時，許多重要媒體（如時代雜誌、經濟學人、富比世、CNN 等）都在探討臺灣防疫成功的背後因素。日本 NHK 公共電視台在 3 月 10 日的專題報導稱讚臺灣的防疫成功，特別是一系列的口罩政策應變作法。日本朝日新聞在 3 月 6 日報導臺灣政府在防疫上超前部署，並與民眾充分溝通，使民眾沒有陷入恐慌，防止了疫情的擴大。

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3 月 6 日盛讚臺灣在防疫上奠定了黃金標準，即早期介入、指揮架構明確、資訊透明，告知民眾如何有效控制疫情蔓延。英國經濟學人在 3 月 26 日專文分析臺灣防疫成功的因素有 3：善用專業人士反應迅速、善用

大數據疫情公開透明、對中國資料不信任。CNN 在 4 月 5 日專題報導臺灣是全球防疫最佳者，為民主國家可以不用採取封城的成功案例。法國第一大電視 TT1 於 4 月 19 日以「臺灣的秘密」為題，專題報導稱讚我國的超前部署是成功關鍵。7 月下旬美國知名媒體彭博社（Bloomberg）比較 75 個經濟體防疫表現後，推崇臺灣為第一名，是民主國家對抗疫情的典範。

3 月 14 日疫情指揮中心總指揮陳時中部長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指出我國防疫有成的關鍵因素在於：政府因有 SARS 經驗早已長期準備、搭配專家群的意見政策決定有依據、政策決策透明、且與人民溝通良好，人民素質高並高度配合政府政策。

## 柒、從三大哲學觀檢視我國防疫的成功

茲就三大哲學觀所主張的政策制訂目的與成功條件，來驗證我國的防疫政策是否符合：

### 一、功利主義

依功利主義觀點公共政策應該追求績效，提升社會福祉，成功關鍵在於政策制訂以專業績效為導向，並補償受害者。

#### （一）防疫政策重視專業與績效

政府及早部署，迅速制定各項防疫政策，建立明確的指揮領導系統，同時各項政策制定皆聽從醫學專業；從成立疫情指揮中心、登機採檢與加強檢疫、徵收口罩等相關醫療物質、口罩實名制配售、醫療機構分流加強演練與裝備、觀光旅遊分級示警、延後學校開學、擴大居家檢疫或隔離、結合入出境、健保與電信的智慧疫調、到限制外人入境等政策。我國的防疫政策完全是醫學科技專業掛帥與績效導向，而非如不少國家領導人的不尊重專業，常因政治考量而作出不少妨礙防疫的政策。

#### （二）照顧少數行業與員工因防疫政策造成的損失

對於因政府防疫政策，如提升旅遊警示、停止航班、禁外國旅客入關等，而造成航空業、旅遊業、遊覽車與計程車等行業商家與從業人員的損失，政府皆酌予補

助或低利貸款。

## 二、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認為公共政策可以校正市場失靈，提升公共利益，政策成功條件在於公開公正的法治與重視人權，同時照顧弱勢。

### （一）防疫政策皆依法行政與保障人權

政府對傳染病的防治政策或措施皆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與其相關規定辦理，包括疫苗接種、監視預警、檢疫與隔離、醫療物質的管制與徵收、補償、醫療網建置、疫情指揮中心成立、進出口與出入境管制等。法規制定時亦考慮人權與社會倫理，同時保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二）補償防疫政策下受害的弱勢

依據 2020 年 2 月 25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規定，對於執行防疫任務的醫護人員或相關人員給予津貼，如造成傷亡則予以補助。對於為降低社會傳染，而必須居家隔離或檢疫者，或集中檢疫或隔離者，政府亦予以每日的生活津貼。

## 三、社群主義

社群主義者主張公共政策制訂目的在追求集體目的，政策成功條件在於鼓勵公民參與、做好政策宣導與溝通，以取得信任與認同。

### （一）防疫政策以集體安全與繁榮為目的

政府所有防疫政策皆以防堵病毒於境外為首要，從管制大陸旅客與陸生回臺、停止小三通、到限制外國旅客入境與轉機等，皆是以臺灣人民的集體安全作考量。而政府紓困與振興經濟方案皆是以刺激臺灣地區的消費（如三倍券的發放）與投資需求，持續經濟成長與繁榮為目的。如已獲立法通過的特別預算 2,100 億元（第一階段 600 億元、第二階段追加 1,500 億元）、特種基金與移緩濟急支出 1,400 億元，以及低利貸款金額 7,000 億元，3 者合計即高達 1 兆 500 億元。

## （二）政策強調歸屬感與同胞愛等美德

對於滯留武漢湖北的近千臺灣同胞，政府及時表示希望比照美日等國專機接回，雖經中國臺辦的百般阻撓，仍先後以 3 班專機與 4 班的類專機接回；滯留他國的國人，政府亦利用各種管道積極幫助返國。有關口罩的管制購買造成排隊人潮，民間發起「我 OK 你先買」運動，雖每日長龍排隊購買仍鮮少發生不愉快事件；對醫護人員的辛勞，臺灣社會時有傳出人民主動慰勞的情事，國人可以說充分發揮了同胞愛，形成集體的道德。

## （三）主動宣導政策與加強溝通

防疫中心成立後每日由陳時中部長偕同相關主管專家開記者會，為國人報告防疫工作進度、新頒訂的政策措施、以及疫情的最新發展，透過記者會聆聽民意，同時也讓人民可以了解政府防疫進度。如此公開透明的作法，可以化解民眾不同的認知與容納不同的意見，贏得國人對防疫政策的認同，願意配合政策的執行。如國人在防疫期間展現出來的是主動配合各項政策，為減少病毒的傳染，民眾習慣於戴口罩與勤洗手，受管制者也大多充分配合。

## 捌、結語

有關公共政策制訂的目的，功利主義認為可以提升社會福祉；自由主義認為可以校正市場失靈提升公共利益；社群主義則認為政策目的在達成社會集體目的。關於公共政策成功的條件，功利主義強調專業績效導向與補償受害者；自由主義重視政策推動應在法治基礎上，公開與公正，並照顧弱勢；社群主義強調政策的溝通宣導，鼓勵公民參與，爭取認同。一項公共政策應該融合三大哲學觀所強調的制訂目的與成功條件，如提升社會福祉與公共利益、達成集體目的、專業績效導向、公正透明的法治、保障人權與照顧弱勢、鼓勵參與爭取認同等。我國的防疫政策作到了這些要求，故能為世界第一、國際楷模。

## 參考文獻

- Caplan, B. (2007).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M. (2009). *Civil society* (2<sup>nd</sup> Ed.). Cambridge, UK: Polity.
- Fischer, F. (2003). *Reframing public policy: Discursive politics and deliberative practice*. Oxford, M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yek, F. A. (1960).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cks, J. R. (1939). The foundation of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49, 696-712.
- Kaldor, N. (1939) Welfare propositions o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 *Economic Journal*, 49, 549-552.
- Kant, I. (1785).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Transl. by H. J. Paton. New York, NY: Harper Torchbooks, 1964.
- Lasswell, H. D. (1971).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cy science. In H. D. Lasswell (Ed.), *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s* (pp. 1-13). New York, NY: American Elsevier.
- Majone, G., & Wildavsky, A. (1979). Implementation as evolution. In J. L. Pressman & A. Wildavsky (1984, Eds.), *Implementation* (pp. 163-180) (3<sup>rd</sup> E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ll, J. S. (1859). *On liber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T. C. (1989). The opera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9(6), 511-521.
-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NY: Basic.
- Pareto, V. (1894). IL massimo di utilita dato libera concorrenza. *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 9, 48-66.
-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n, H. S., & Gayer, T. (2013). *Public finance*. Boston MA: McGraw Hill.
- Sandel, M. (2009).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New York, NY: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Weimer, D. L., & Vining, A. R. (2017). *Policy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 (6<sup>th</sup>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A Review of Taiwan's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Philosophies

Jen-Hui Hsu<sup>\*</sup>, Yun-Huei Chiu<sup>\*\*</sup>

## Abstract

In 2020,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aiwan in its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What is the key to Taiwan's success in achieving virus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uccess from the policy philosophical views of utilitarianism,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According to utilitarianism,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licy is to improve social welfare, and successful policies should pursu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beralism, the intervention of government can correct market failures. And, successful policies must be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throug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also taking care of 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s. Communitarianism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community memb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venant. The purpose of public policy is to promote group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A successful policy should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communication, and encourage al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pursuing the common goal. Responding to foreig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jhhsu07031955@gmail.com.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bubunichiu@gmail.com.

media inquiries, Health and Welfare Minister Chen Shih-Chung said that the key to successful protection from COVID-19 lies in “experts,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at is, policy making should follow the opinions of experts,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should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and full cooperation of the people is also needed. The policy of Taiwan’s combat against COVID-19 can be described as a combination of these three policy philosophical views. Policy formulation is guided by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governed by law and transparency, and policy dissemination i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win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nd form a consensus, to achieve the national goal.

**Keywords:** public policy, COVID-19, utilitarianism, liberalism, communitarianism